

近期，因工作需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连续三次来到佛子岭水库文化馆参观学习。

佛子岭水库文化馆是在原佛子岭水库纪念馆的基础上于2023年9月底建成并对外开放的。文化馆内设多个功能区，布展面积800余平方米，通过图片、实物和多媒体展示，详细介绍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历史、文化背景和重要事件，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在我国乃至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

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展区“英明决策”四个金黄大字，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历史背景。尽管已经来了三次，在毛泽东主席关于治淮工作“四次批示”的橱窗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透过眼前这一份份陈旧发黄的电文，一行行刚劲有力的“毛体”，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四次批示”背后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后，700余年间淮河道淤塞、灾害频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发展为“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之多的孕灾重地。1931年特大洪灾使皖北沦为“乞丐之地”，1938年国民党“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将淮河流域推向灾难的深渊，直至出现“越治越糟”的困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旧社会制度性缺陷的必然结果。

1950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再一次袭击了淮河中上游地区，雨水汇聚成滚滚洪流，摧毁房屋，淹没农田，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决口作休，虽然淮河流域自古多灾，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水利工程长期失修，又遇连年战乱，这一次的灾情，无论在地域还是严重程度上，都十分惊人。

河南告急！苏北告急！皖北告急！面对重大灾情，心系淮河治理，毛泽东64天作出4次批示，水利部连开19天治淮工作会议……

7月20日，一封来自华东防汛指挥部的紧急电报——《皖豫水灾情况报告》上，一串刺痛人心的数字，让毛泽东眉头紧锁：正阳关以上右岸已全部漫决，正阳街上水深数尺，阜阳区全淹600万亩，宿县区淹500多万亩，滁县区淹30万亩，蚌埠淹10万亩……毛主席当即将电文批转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汛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汛，（二）根本导淮两问题。”批示中首次将“临时救灾”与“系统根治”相结合，首次将治淮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面对这场波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的大灾，收到批示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立即调拨3000万斤粮食救灾，并增派车运班次疏散灾民。总理一面亲自协调部署救灾工作，一面着手筹备根治淮河的方案计划。

然而，灾情还在持续升级。8月1日，《皖北灾情报告及救生工作意见》再次送到主席案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字句，毛主席下定决心，不能让大灾重演！他在“489”这组数字旁特意做了标注。

8月5日，距第一次批示刚刚过去16天，毛泽东提笔作出了第二次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必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

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背后的人民情怀

2025年2月22日，启动自驾南方行行程，途经湖北黄冈、江西共青城一线，相继进入赣、闽、粤的瑞金、上杭、梅州等地由青山、红土、清风、红旗共同勾勒出的红色区域。这是一方热土，这是一个起点，这更是一座丰碑。时至今日，探访这片红色土地，一段段红色记忆依然鲜活……

大柏地战斗：最有荣誉之战

大柏地位于江西瑞金地区，地形险要，1928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进发，一路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2月9日红军抵达大柏地，10日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设伏，成功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缴获枪支800余支，取得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的首次大捷，拉开了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序幕，被陈毅赞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此次战斗走出了46位开国元帅。伟人毛泽东曾留下《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光辉诗篇，岁月流转，大柏地的硝烟早已散去，如今的战场旧址，仍保留着当年的弹痕遗迹，见证着这段光辉历史。

红色故都：世人景仰的革命圣地

瑞金和全国摇篮景区包括叶坪、红井、二苏大会址

沈子修，清光绪六年（1880年）元月出生在霍山县与儿街镇凡冲村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读于家乡私塾，1903年秋考入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也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在学校里刻苦钻研，饱读中外经典，接受新思想。1907年夏毕业时由同盟会会员吴锡谷（合肥人，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青年学社）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投身革命，致力反帝反封建斗争，求民主争自由，全身心投入到各个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乡邻都说，凡冲村出了个不凡凡人。

追求民主的斗士

沈子修早年受易盼谷、蔡元培(时任国民教育总长，后任北大校长)等人的进步思潮影响，民主与科学深深地在脑海里留下。1911年辛亥革命的电声震撼了全国，沈子修积极投身这场革命，10月29日，他领导以霍山同盟会分支为首的革命团体，配合军兵百余人光复了霍山县城。不久袁世凯窃取军国实权，指使军阀倪嗣冲(阜阳人，北洋时曾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入皖，迫害革命党人，导致地方反辟势力大肆抬头。沈子修与朱蕴山(金安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人强烈反对，并与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1916年春他与朱蕴山等秘密组织讨袁第一军，策化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军密等人被捕，沈子修等人逃往上海避难。在上海期间，沈子修没有停止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营救朱蕴山等革命党人行动。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遍嘶声讨声中暴死，朱蕴山获释，沈子修回到芜湖，任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校长，并兼任安徽教育会总干事。这给他革命生涯搭建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1918年9月，沈子修受朱蕴山、桂月峰(金寨人，同盟会员，后加入共产党的邀请)回到六安，担任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校长。五四运动暴发，沈子修参与领导安徽教育界发表宣言，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声援五四运动。

反动军阀倪嗣冲从1913年起，在皖十年，压榨民众，横征暴敛，滥发纸币，任人唯亲，民愤极大，终导致“反倪”运动。沈子修一人时间支援安庆反倪闹冲运动：在反军阀倪道娘(倪嗣冲之侄，抗日期间曾出任安徽伪省长)三届议会中贿选及驱逐省长李兆珍(福建人)等斗争中，沈子修、朱蕴山等脚脚相踵地站在学生群众一边。在六安烧毁贿选票箱，收集假选票情况，揭露皖道娘舞弊，用法律手段向皖省政府控告军阀倪道娘、马联甲(江苏人，北洋时曾任安徽省长)的罪状，致使其阴谋未能得逞。沈子修也成

从“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背后的人民情怀

程先畏

即开始动工。”此次批示将治淮计划的时间节点进一步明确化，治淮工作的极端紧迫性跃然纸上。

“河南排，苏北堵，中间的皖北最受害。”这句流传在淮河流域百姓口中的顺口溜，或可概括当时淮河水患的复杂局面。河南、皖北在上中游，希望将水引向下游，而位于下游的苏北，却指望中上游两省蓄水抗洪。如果要根治淮河，除皖北地区外，豫南、苏北计划好的农业生产、土地改革都会受到影响，而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方方面面的繁重工作。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两次政务会议进行协调。虽然需要权衡的问题极为复杂，但因为淮河水灾严重影响着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周总理的意见十分坚定：“水灾非治不可，如果不洪就荒，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

8月31日，为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毛主席又作出了第三次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这句话彻底打破了地域藩篱，河南固然、安徽阜阳、江苏淮阴三地民工第一次在统一号令下集结。是年深秋，180万治淮大军手持原始工具开赴工地，其动员速度之快令前苏联土壤和水利专家柯夫达惊叹不已：“这需要怎样的政治凝聚力？”

从8月25日到9月12日，连续19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并指导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最终作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案。在随后召开的政务会上，周总理特别强调：“这次治淮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9月21日，为推进治淮工作，毛主席在《淮北灾民的情况及调配粮食的意见》上再次作出批示(第四次)：“现已九月底，治淮工程不宜久延，清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三个“早日”如重槌击鼓，催生了新中国首个大江大河全流域治理工程。次年1月，佛子岭水库在皖西山坳破土动工，这座当时亚洲第一的连拱坝，正是四次批示催生的“头胎儿子”——工人们用竹筐运送混凝土，却在苏联专家断言“不可能”的异样目光中，仅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便筑起了这座水上长城——“世界第一高坝”。

1954年7月，一场特大洪水正考验着这座新生的水坝。当淮河干流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时，佛子岭水库硬生生将每秒6430立方米的洪峰削减至2300立方米。下游正阳关的百姓看见洪水在闸门前低头东去，自发在堤岸焚香跪拜，把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称为“新禹王庙”。

如今，站在水库观景台眺望，70多米高的连拱大坝依然气势恢宏，20个拱坝如同巨人的肋骨，守护着下游2000万亩良田。坝体镶嵌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朱红大字，历经70余年风雨洗礼，依旧鲜艳如初。那些消逝在岁月里的扁担号子，那些凝固在混凝土中的鲜血汗水，那些镌刻在“四次批示”里的赤子之心，早已

赣闽粤大地上的红色记忆

卫先庆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中华苏维埃纪念馆四大红色景区，总占地面积4550亩，是中宣部首批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这里的一座宗祠，诉说着革命的前世今生；一口红井，浸润过几代心灵；一篇著作，反映党与人民的血肉情深；一片旧址，铭刻着伟人经天纬地的身影；一草一木，留下无数先烈的血迹；一山一水诉说着苏区精神的真谛。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预演”，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开始了治党、治军、治国的全面探索。这里喊响了“毛主席”的称呼；这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文化、经济、法制等各项建设上的“百个第一”，这里培养造就了9位开国元帅，8位开国大将，35位上将、114位中将和440位少将等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这里“红井”的故事家喻户晓，代代传颂。党史专家以“上

化作滋养两岸人民的精神沃土。

纵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四次治淮批示，时间跨度仅64天，密度实属罕见。批示内容明确具体，从“应急救灾”到“系统治理”，奠定了治淮工程的总基调，语言逐次强化，由“考虑根治”到“限日完成”，再到“三个早日”，凸显出决策层面的紧迫感；批示直接推动形成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淮河流域上演了一场震撼人类的山河再造。至1957年，全流域建成佛子岭、梅山等9座大型水库，疏浚河道达1700公里。这不仅扭转了淮河“700年不治”的历史困局，开创了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水模式，更彰显了人民领袖和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改革的春风吹拂淮河两岸，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地续写着光辉的治水史诗。1960年，邓小平在淮河流域视察时，攥着群众的手动情地说：“淮河不治好，老百姓的日子就翻不了身！”一句疾呼，道尽了治水文澜的紧迫，更格下了人民领袖心系苍生的赤子情怀。1991年，江淮特大洪灾后，江泽民冒雨查看蒙洼蓄洪区，在庄台泥泞小路上叮嘱：“蓄洪区群众的牺牲奉献，要用制度补偿来回报。”这番话语催生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的出台，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员升华为法治保障。2007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初，胡锦涛视察安徽时，特意来到王家坝镇李郭村村民郑继超家里，听说各种补贴已全部发放到户，他十分高兴地说：“看过以后，我心里踏实了。”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阜南蒙洼蓄洪区的西田坡庄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十分牵挂灾区群众，这次专程来看望乡亲们。”19日，合肥骆岗大堤之上，他望着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的同志们时说：“今天的日子就盼望大家。”20日，总书记已在合肥专“听取了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两次“专程”看望，一个专题会议，表达的是总书记对防汛救灾一线的深深牵挂。

从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掀起的治淮壮举，到习近平总书记肇画的美丽中国，淮河——这条流淌着文明记忆的大河，始终见证着共产党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思想扎根淮河两岸，古老的治水智慧获得了新的生命。蚌埠龙子湖的生态修复工程中，设计师巧妙利用海绵城市技术，让市民公园兼具防洪调蓄功能；徐州贾汪区的采煤塌陷地，蝶变成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新时代的“民心工程”，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画卷。

当晨雾散去，淮面上泛起金色波光，河岸防洪林中华来布谷声声，仿佛在传唱着一首永不老去的长歌。歌声里，有历史深处的奋歌号子，有改革春潮的机器轰鸣，更有新时代的生态交响，它们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壮丽诗篇。

当淮河北调的清流穿越淮河，我们仿佛看见“四次批示”如同四颗恒星，永远照耀着共产党人的精神星空——那里闪耀着“人民至上”的不灭光芒，奔涌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磅礴力量，更传承着中华文明“以水为师”的永恒智慧。

当乡村振兴的稻浪涌向天际，我们仿佛听见了从“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的回响——那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那是中华五千年治水文明在新时代的璀璨绽放。

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背后的人民情怀

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的精辟概括，彰显了瑞金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瑞金不愧是红色故都，世人景仰的革命圣地；不愧是共和国摇篮，吸引着无数寻根溯源的目光；不愧是理想信念教育不可或缺或的红色之旅驿站。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因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而闻名遐迩。古田会议会场，原为始建于1848年的廖氏宗祠，建构完美，飞檐翘角，座东朝西，砖木结构，有庭院、前后厅和左右厢房。

这次会议是红军初创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重要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确立了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建军建军原则，揭开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崭新篇章，对于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有效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进程充分证明，古田会议精神，是引领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是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力，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业学校校长，1947年担任安徽省教育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省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主任委员等职，一直分管联系教育工作。

沈子修治学严谨，极力革除封建教育的一切陈规陋习，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民主革命思潮，积极推行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倡导教、学、做合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在“三农”时，他曾拓荒70余亩做农林场，作为学生的实习园地。他致力民主治校，让学生代表参与决策学校重大事项。他支持并参与爱国学生的民主活动，他言传身教，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患难与挚友

作为民主进步人士，沈子修一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团结合作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21年，安徽暴发了驱逐“杀人魔王”李兆珍运动。王步文(岳西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了沈子修的鼎力配合和支持。1923年，沈子修在芜湖“二农”担任校长期间，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江苏人，中共党员，时任中国共青团宣传部长)来校演讲，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六安“三农”担任校长时，沈子修亲自在课堂上讲授十月革命的意义，讲解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作品，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启发学生信仰马列，精心培育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使很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刘湃西、桂伯炎、陈绍禹、王逸寰、吴干才、吴岱新、戴国兴等等，后来成为了皖西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骨干。

作为安徽国民党左派领导，沈子修衷心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同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殊死搏斗。1926年，沈子修作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九大执委之一、常委组织部长，对另两位执委薛卓汉(寿县人，中共党员)、周范文(六安人，中共党员)的工作十分重视，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工作和成长。

1927年，沈子在武汉设立“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多次邀请共产党领导干部李立三、李达、毛泽东、恽代英来校讲授工、农、青运及三民主义。

1932年后，沈子修先后在贵池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和凤阳师范担任校长，邀请共产党人童汉章(合肥人)来校任教，公开传播革命理论。

抗战暴发后，沈子修担任安徽省战时民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吸收很多共产党员在里面从事中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全民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作为大别山腹地和安徽西大门的六安市，以其重要区位、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节点和重要活动而载入安徽抗战的光辉史册。

红28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

战红旗不倒

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在太湖凉亭岭(今岳西县)召开干部会议，将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下设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6月，红二十八军军政机关迁至岳西县藕落坪，今年是红二十八军重建90周年。

1935年2月至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鄂豫皖省委失联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军疯狂“清剿”“驻剿”“追剿”，在地方武装和大别山人民的支持下，创造性总结出“四打四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成立了集党、政、军于一体的便衣队82个600余人，昼伏夜袭，声东击西，化装智取，把游击战术用到极致。他们转战于鄂豫皖3省45个县，大小战斗243次，歼敌18个营15次连约7.5万人，牵制国民党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开辟了游击根据地22个县，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红军高扬的斗争，队伍由第三次重建时1000余人壮大到3100余人，锻造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红军队伍，谱写了大别山三年红旗高扬的壮丽篇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彪炳史册的功勋。红二十八军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畏强敌的勇气、艰苦奋斗的精神、秋毫无犯的纪律、军民团结的情谊和红旗不倒的奇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

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皖中抗日先锋

1937年7月15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根据延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有关文件精神，向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谈判倡议。7月22日至27日，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卫立煌部少将参谋刘刚夫、皖西保安司令部副官郭永新三方代表在岳西青天畹汪氏祠堂举行为期6天的艰苦谈判。

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在岳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的三方签字仪式。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鄂豫皖边区10年内战结束，红二十八军首开南方8省14支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实现区域性国共合作抗日之先河。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等在红安县七里坪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师第四支队(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经理部主任吴元先，下设第七、八、九团，手枪团和3个直属队，合计3100余人。第四支队是南方新四军4个支队中部队规模最大(占37%)、红军成分最多、武器装备最好(38%)、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支队。

1938年3月8日，第四支队在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3月14日由七里坪出发的第七、九团和手枪团与由确山竹沟出发的第八团(豫南游击队改编)在立煌县流波铺(今金寨县)会师并整编。3月下旬，成立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高敬亭，副主席戴季英。

1938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第四支队经金寨、霍山、六安、舒城、庐江县等，在舒城、庐江、巢县边区作扇形展开。5月，第四支队后方机关进驻舒城县高峰乡东、西港冲，其中司令部机关驻西港冲钝斧庵，政

第四支队在高峰乡钝斧庵建立根据地

共的工作，他直接领导的组织部里，其总干事周新民(庐江人，建国后任中办副主任)、主任干事张劲夫(肥东人，建国后任国务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沈子修都会全力支持 and 赞同，同时做好了掩护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共产党的建设。

沈子修晚年曾说：“积我五十年革命经验，只有跟共产党走，国家才会昌盛，人民才会幸福，我个人才有前途。”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廉洁奉公的楷模

沈子修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即便在旧中国，他也从不用雇员，外出必步行，无特殊情况从不坐轿。在校任职时，学校经费拮据，常把他自己的财物典当变卖，用来充公，对因难师生经常倾囊相授。他桃李满天下，我党不少高级干部如陈绍禹、李克农、柯庆施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却从未因私事找过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沈子修曾为中央民盟委员、民盟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位高权重，更是严于律己，常往拐弯走，也从不允许家人乘坐公车办私事，也从未有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子女和身边的人民谋私，家乡人找到他办私事的，他也婉言谢绝。

沈子修常年在外，但家乡情节没齿难忘。这里述一个史实故事，可见一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沈子修回到家乡霍山，当得知他侄子沈利川(要去南京看望姐夫谢谦如(霍山人，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主任秘书)时，立马想起要为他乡做一件实事，因为当时监察院院长是于右任(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公的墨宝是非常难得的，他让侄子见到于公时代为好，并请于公为霍山的景题匾号“小南岳”三字。于公欣然接受，并说：“找我讨字的，多是自己，独全德(沈子修的)字”例外。

如今于公狂草“小南岳”三字贴于庙门之上，为南岳山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也为家乡人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955年12月，沈子修病逝于任内，享年75岁。一代革命老人走完了坎坷不平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生。



沈子修

皖西文化名人